

杜滋龄:生命之境 笔墨之歌

■ 邵大箴

在现代水墨人物画领域辛勤耕耘了数十年的杜滋龄,是我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水墨人物画家之一,他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在许多方面和20世纪以来的前辈和同辈杰出艺术家有相同之处,但在题材内容和形式语言上却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作品有独特的个性面貌。

成果卓越的现实主义人物画

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现代人物画坚持的写实方法和传达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西方现代艺术背向而行,因而缺乏现代性,是陈旧的绘画形式。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由于它借鉴和吸收西法以充实中国画人物画的表现手法,导致了人物画笔墨传统的失落,由此,现代写实的中国人物画“西化”了,缺少民族精神。综观20世纪世界艺坛,不能不承认西方的现代艺术独占鳌头,影响很大,它的出现与西方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与西方现代哲学、与人们现代的生存环境和新的审美追求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它的产生与存在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但是,这并不意味西方式的现代主义应该一统天下,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传统艺术形态都应受束之高阁,再无生存价值。事实上,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在各个民族和地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能不受到特定民族和地域历史文化以及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不能脱离社会对艺术的需求和大众审美习惯。将一种艺术模式强加于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地域,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的“中和”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决定了艺术在新变中发展,不求急剧的变革,坚持对传统推陈出新的原则,而不是用颠覆传统的方式求新求异。

20世纪西学东渐、西方写实绘画进入国门时,我国文化先驱们智慧地采取了有分析地接纳和借鉴的态度,主张在尊重、维护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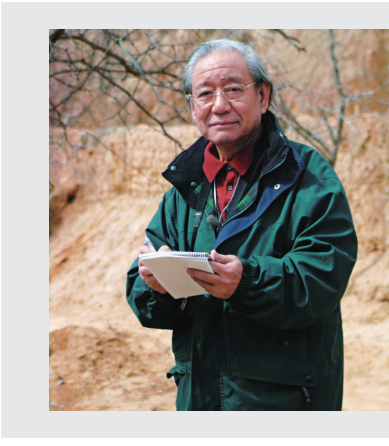
晴云(国画) 97×180厘米 2008年 杜滋龄

行中西合璧、交融或结合的创造。对近现代中国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影响最大的徐悲鸿、林风眠等,都积极提倡中西合璧的方针。徐悲鸿在五四运动期间发表的《中国画改良论》明确指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林风眠把融合中西当作美术运动的目标,他为杭州艺专拟定的标语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刘海粟主张:“一面尽力发掘我国艺术史也属固有之宝藏,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艺术,所以旋转历史之机运,冀将来拓一新局面。”众多人物、山水、花鸟画家,均不同程度地从西画中吸收养分,为中国画表现语言增添了新元素。在中西融合或中西合璧的大潮中,具有现实主义品格的人物画成果卓越,涌现了几代杰出艺术家: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黄胄、杨之光、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刘文西、卢沉、周思聪、刘国辉、吴山明和本文论述的杜滋龄等,以及比他更年轻的一代。这是阵容可观的新老艺术家群,他们用笔墨在宣纸上描绘历史和现代人物,创造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大画廊。我国现代人物画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局面,不仅一改长期以来中国画领

域人物画的颓势,而且以其新的题材内容和以线为主要语言的表现形式在世界艺坛独树一帜。

坚持写生的多面手

杜滋龄之所以执着于写实手法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水墨人物画,因为他有用水墨语言使人物画发扬光大的坚定信念。出生于1941年的他,自幼有绘画天赋,虽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本科深造,但靠勤奋自学成才,被破格吸收到进专业单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杜滋龄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做编辑工作,由于他勤奋地强化造型与笔墨基本功、绘画水平大有长进,在连环画和文学插图领域做出成绩,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并受到叶浅予先生的看重,悉心给予指导。1979年至1981年,杜滋龄就学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生班,从师于叶浅予、李震坚等先生,学识与视野、功力与修养均有很大提高。学业结束后,已经跻身画坛的杜滋龄,又长期担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后又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任教授和系主任,一面从事繁重的美术编辑和教学工作,一面在绘事上做创新探索,取得丰硕成果。



杜滋龄是一位多面手,他创作了一些古代革命家和文艺界名人的肖像,也钟情于古代名士肖像和文学插图,如描绘苏轼形象及其诗意画,为老舍先生《骆驼祥子》创作的插图。但描绘现代各民族人物形象,构成他艺术创作的主体,也是他主要的艺术贡献所在。

扎根生活,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创作的资源进行人物写生是杜滋龄认定的须臾不可离开的基本功。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内陆海域,尤其醉心于西域边陲,对这块辽阔土地、雪域世界上勤劳朴实的人民和自然风貌,怀有浓厚的兴趣和感情。他到藏、蒙古、回、傣、朝鲜、苗、布依、塔吉克、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彝、壮、侗、瑶、哈尼等民族中间深入生活,创作了不少人物感情真挚和笔墨语言浑厚而灵动的作品。

杜滋龄的坚实造型能力是通过大量写生和观摩中外经典作品获得的。受叶浅予、黄胄艺术的启发,他特别注意速写技巧的提高,反复练习,提高心、眼、手配合的敏锐观察力和迅速准确的描写能力,训练对客观物象的记忆力和默写能力。读他大量普通人物的写生,可以明显感觉到,他都在对人物的认识和理解之后,专注于他们的精神世界,努力以形写神,求形神兼备,表现他们

人物名片

杜滋龄,1941年生,天津人。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师从叶浅予、李震坚先生。曾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系主任,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艺委会第一、二、三届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五、六、七届理事。现任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丰富的感情。他笔下都是有个性和有生命活力、使人感到亲切的善良的人。在形象刻画上,他尤其关注眼神的刻画,讲究画面和人物形态的整体感和单纯感。无疑,这些作品是名副其实的写生创作,而不是以搜集素材为目的的简单写生。

在继承中探索和变革

和许多当代中国画人物画家一样,如何处理素描造型与笔墨语言的关系,一直是杜滋龄人物画创作探索的重点。他继承前辈艺术家的经验,既重视人物造型的结构,又十分关注笔墨语言。他与许多同行一样有这样的认识:人物形象塑造的形与神是中外艺术共同的追求,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尽相同而已。“不尽相同”说明绘画语言的差异,但并非完全不同。如表现客观物象的形,如何处理线与体面的关系,传统中国画主要用线,辅以块面;西画主要用体面,辅以线。前者重写意,也有形似的要求;后者重写实,也关注神韵。况且中西绘画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审美也有不同的侧重,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如我国文人画的表现语言与唐宋绘画就不尽相同。杜滋龄坚持广泛吸收

宋建明:一位“好色之徒”的色彩之途

本报记者 冯智军

学者风采

色彩,如同空气,每个人都司空见惯地身处其中。有这么一群人,在色彩学科里不断地探索其中的奥秘,“好色之徒”,也许是坊间对他们戏谑而恰当的称谓,宋建明就是其中的一员。

宋建明,色彩的研习者、思考者、追问者、实践者和建构者,他将色彩与设计看作一团云,“尽管我们一路上都在走、在看、在思考,但它的边界在哪里?它可能就是盲人摸的那个大象,实在太庞大了,我只能是摸一点认识一点。”从20岁至今,经过40年的反省、实践、迷茫、思考、整理、建构,宋建明再谈起设计、色彩,再也不会像当年那样迷茫了。“心、眼、图、物、境”与“人、事、物、场、境”,面对这团云般的“大象”,宋建明用了两组10个字作为对内与对外探究方法的钥匙,来概括关于色彩与色彩设计训练及色彩现实营造的方方面面,而这其中,“境”最重要,因为,它与人心、人性及美感紧密相连。在他看来,色彩就是解决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问题。

色彩发生在哪里?宋建明认为就是衣、食、住、行、用、玩、赏、商,“在当今我国的现实社会中,所谓的玩、赏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与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联,与产业关联。回望我们的城市与乡村,尽管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平庸化、乏味现象还是举目可见。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在我们的周遭比比皆是。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色彩是其中一个维度。”宋建明说,我们这个行业不能简单地前行,要在脚踏实地中不时仰望星空、遥望前方,去思考这类问题,做所谓的无为之为、无聊之聊的工作,这大概也是文创领域的学科、专业和行业的特征。

从迷茫中开始探寻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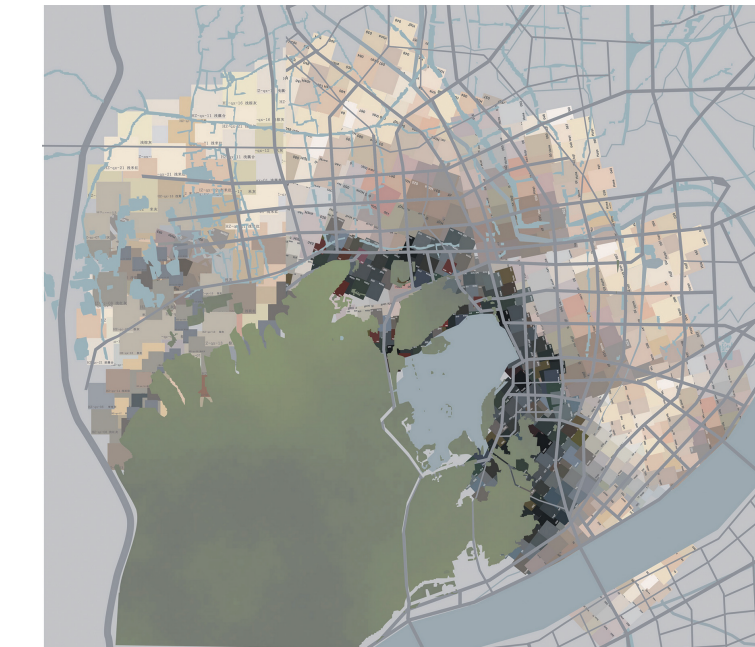
1978年,宋建明从福州市美术公司的一名美工考入中国美术学院,学的是染织美术设计专业。宋建明有很好的绘画能力,对色彩也非常敏锐,按理说做好产品设计的色彩应该顺理成章。然而,宋建明从绘画色彩到设计色彩的转化过程并没有感觉到想象中那样的得心应手,总是达不到他预想的效果。“转化的时候我觉得很吃力,虽然不难看,但没有我想象得好。”

年轻时宋建明深为苦恼,总觉得应该有规律可循,他凭着一股血气,立志非搞明白色彩究竟不可。于是他带着问题求教很多的师长,但没有得到让他满意的答复。再翻阅书籍,当年色彩学的书籍少且浅显,也是空手而归。于是他就开始再扩大到外文书籍中继续探寻。大学里学的是日文,于是他就靠着课堂所学,连猜带蒙地从日文色彩学文献里找到碎片化的线索。当然,中国美术学院一直有“读书养心,劳作上手”的传统,于是他就一边模仿着实验,一边继续追寻规律,从传统中国色彩又追踪到了包豪斯的色彩教育,再追到了现代色彩科学技术体系。从大二开始,宋建明就利用了所有的课余时间边琢磨边实验,慢慢地勾勒出了一个设计色彩学的“云团”。也正因为他这种钻研的劲头,被系里的领导和老师们看中,毕业后他留校继续研究色彩。

1985年,学校决定选派宋建明等人去法国学习。临行前,前来讲学的赵无极先生告诉他,法国最好的设计学校就是他任教的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以下称装饰艺术学院)。因此,抵达巴黎之后,他与同行的王雪青商议,一同放弃法方为他们安排的马赛美术学院,设法进入装饰艺术学院。但这个学校的录取门槛非常高,是教授治校,必须有法国教授接纳才行。人生地不熟的宋建明,只好硬着头皮“硬闯”,看情况再议。

到了装饰艺术学院里,宋建明怯生生地走进一间教室旁听,授课的正是创立“色彩地理学”的著名色彩学家、色彩设计大师让·菲力普·郎科罗。课间,郎科罗教授发现了一张陌生的东方面孔,便特别感兴趣,原来他年轻时去过日本留学,宋也能够用日语与之交流,按照宋建明的说法:“就是缘分!”郎科罗教授当场就在宋建明的推荐书上签了名,从而使得他顺利入校开始了西方色彩学体系的学业。郎科罗教授可谓是他的“贵人”,引领他进入他的“3D色彩工作室”实习,让他对法国乃至欧洲时尚色彩及其设计的方式、方法和规律有了直观的认识。在欧洲留学期间,宋建明走过很多城市,用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拍了几千张幻灯片。

在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听到西方教授倡导文化的身份,这开启了自我色彩



杭州城市色彩主旋律水墨淡彩

文化身份的辨识,于是,宋建明结合东西方乃至更多元的色彩文化体系进行了解构、比较和创新的理解和认知,从而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色彩之路。

在现实语境中创新色彩体系

1990—1993年,宋建明再次应装饰艺术学院邀请前往做色彩研究与讲学。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如火如荼,而大拆大建、对色彩的漠视、建筑品质的平庸等隐忧也开始凸显。回国后的宋建明做了很多讲座,针对现实状况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虽然很多人包括许多地方领导听了都说好,但却没有人去找他做顾问来进行建筑群落的色彩规划。

直到1998年,杭州的湖滨地区要进行城市改造,感觉细腻的杭州建设者发现了城市片区中还有色彩问题需要专项的处理,于是找到了宋建明。当时的他似乎“已经不太有信心了,认为中国找不到专门关心色彩问题的人”。现在有了机会,宋建明自然要抓住机会小题大做,把在西方所学的“屠龙”技术都充分地用在这个小项目上。这个今天看起来很短时间就能做好的事情,他花了很多的精力,热身的同时,借题发挥,由此慢慢让

很多人对城市色彩规划有了了解。

到了2003年,学习城市规划出身的时任龙泉市市长梁忆南找到了宋建明,请他做龙泉市的色彩规划。这是新的机遇,同时也是新的挑战,因为此刻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宋建明采用了正宗的“色彩地理学”方法来应对这9平方公里的龙泉城市,心想一定顺利,可现实恰好相反,他怎么也组织不出龙泉城市主色调来。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与分析,他发现了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非常大的不同。西方城市肌理面貌非常稳定,历史脉络清楚,而中国城市形态非常复杂,既有明清民国流传下来的老片区,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老城区,还有改革开放后的新建筑如雨后天春笋般不断涌现,城市早已失去了所谓恒定的主调色。

新的问题需要新的办法,宋建明开始思考,既然这种情况下主调色的理论不成立了,那就创立一个主旋律理论。“城市问题总是复杂的问题,如果把它理解成凝固的交响乐,可解释的话语就比较多了,主旋律、副旋律、背景音乐、华彩乐章、主调、复调、单调等,正好可以对应现在的城市问题。”宋建明就从龙泉找到了三段主旋律,即明清、老城、新城。导师郎科罗教授也非常肯定他

一年的时间,对杭州形态了如指掌,然后提出了方案。公示后,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关注。当时有两个课题,一个是东南大学的城市轮廓线,一个是宋建明团队的城市色彩。虽然轮廓线比色彩更重要,决定着城市的基本形态,但色彩对普通人来说比较新鲜,因此后者格外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关注。

备受媒体追捧的宋建明在采访时说,杭州是由若干组细腻的灰色系组成,然后就有媒体以“杭州灰”为醒目的标题进行了报道。如此一来,很多公众对“杭州灰”表示不理解,进而非常不满,为此,杭州市规划局专门组织了市民代表和宋建明进行沟通交流解惑。当宋建明从学到调研再到规划的过程进行解读后,特别是当市民代表了解到,新的城市色彩规划是通过调研拍摄的两万五千张涵盖杭州各个角落的照片进行认真分析后作出的,公众理解了。

事情虽然解决了,但给了宋建明很大的触动。“我是来自美术学院的人,说到灰色系,美院的人都很清楚,但是没有考虑到普通民众对这个概念的模糊。”也因此理解到,学术话语和公众话语不是一个话语体系,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既然是为人民服务,那就要让人民认可。怎样让人民认可,就要用公众话语。”当宋建明重新用杭州水墨淡彩进行表述后,公众的激情再一次被点燃,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杭州色彩规划大获成功之后,宋建明更是声名鹊起。特别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色彩的重要性,而宋建明和他的小伙伴到目前为止也已经做了60多个城市和片区的色彩规划。“我们已经对中国的6000平方公里编制过色彩规划。这个过程是不断遭遇问题,60多个城市、60多种城市状况,60多种状况,包括要接触到地方政府官员、文化名流、原住民、游客、投资人、产业人等所有与之相关的人。而且每一个地域里的历史渊源、产业特征和发展策略都不一样,城市色彩的策略也不一样。”宋建明说,“遭遇的问题复杂,思考自然要更深入,创新也持续着。这样下来,到今天基本完成了一个基于中国城市现实的色彩规划与营造实践的理论建构。”

从“杭州灰”到“水墨淡彩”的背后

当宋建明的色彩主旋律理论产生并成功实践后,就像是一个拐点,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城市色彩规划。2005年,杭州市政府邀请宋建明对杭州市进行整体的色彩规划研究。宋建明用了近